第五章：
不能錯過的11本書

1. 維克里暗標：具競爭性的共同產權

Eric A. Posner and E. Glen Weyl
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
2018

本書第四章的〈從佐治稅到邁德納計劃〉一文，初稿完成於2018年初；當中提及的「全民擁有創新社區」，更早於2017年初已經提出[註一]。不久之後，瞥見 Eric A. Posner 和 E. Glen Weyl 的新書《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2018）出版，竟以 Henry George 及其當代繼承者、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William S. Vickrey 為主題，實在是乍驚乍喜、激奮莫名。

顧名思義，「激進市場」反映兩位作者仍深信市場機制的重要性，甚至可利用作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兩位作者追溯百多年前的一些市場倡議者，很多都會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不是新自由主義包裝下的「假市場」，而是真正公平開放的市場競爭，其實同樣可以「很激進」。時至今日，他們的主張大多已被遺忘，但放諸全由大企業大財團壟斷的所謂市場，意義仍然相當重大。

在書中提及的激進市場倡議者中，毫無疑問 George 是最重要的一位。他針對土地收益提出的「單一稅」建議，正是衝著壟斷土地的食利階層而來。基本立論是只要土地使用權得到解放，經濟活動自能達至最大的效益。由此市場力量亦會更平等開放地分布，整個社會更能地盡其利、人盡其才。人們現時普遍仍在玩的《大富翁》遊戲，靈感便正是源於 George 對土地壟斷的批判。

意念來自孫中山的方案

正如兩位作者在書中提及，雖然私有產權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佔據主導地位，但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公共財產，所佔比例同樣亦異常地高。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趨勢下，具體管理工作卻不一定由政府直接負責，不少公共財產會進行外判，通過招標方式物色承辦商。部分較大型的投資項目，甚至會通過「公私營合作」（PPP），例如「建造－營運－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長期委託私人企業代為經營。

《激進市場》的討論重點，正是由 Vickrey 提出的暗標競投機制。相比起「單一稅」的 100% 土地徵稅，Vickrey 提出將地租定價交由市場決定。具體建議是將公共財產的使用權公開招標，價高者得。後來者提出的改良方案，則建議繳交地租的價格會是次高的入標價，而非中標者本身提出的最高標價，用意是確保投標者不會刻意抬高或貶低入標價。至今大家仍把這種模式稱作「維克里暗標」。

兩位作者則提出進一步改良方案，其意念乃（意外地）來自孫中山的「平均地權」設想，建議由土地持有人自評地價，政府並按此徵收地稅；惟與此同時，政府亦將可按自評地價收地，此雙重關卡同時確保地主不會刻意抬高或貶低地價。本書作者將其方案稱為「共同產權自評稅」（Common Ownership Self-

assessment Tax, COST），並將適用範圍擴濶至各類公共財產，開放與所有人以自評稅的方式競投，以開放競爭的方式調動全民積極性。

開放承包的共同產權

通過上述開放競投的機制設計，《激進市場》建議將大量公有財產變成共同資產。它們不再由政府自上而下管理或物色承辦商，而是通過高度透明的遊戲規則，讓全民自下而上參與善用這些財產。由於競投機制能杜絕個人壟斷財產，並且迫使承包者通過課稅分享收益，因此它們乃是「非公非私」的共同資產。同時由於此等財產無法再被壟斷和用作謀取暴利，因此亦將大大提升整體財富的公平分配。

兩位作者強調這絕非天方夜譚，因為現時一些共享汽車平台，已採用相近的開放競投機制，實時動態地決定汽車的租金和使用權。分別只在於車租乃是網絡平台的營運收益，而 COST 的課稅則全數成為政府的稅收，不但可用於提供各項公共服務（開拓更多共同資產），同時亦可以「社會分紅」（social dividend）的方式，與全民分享共同資產的收益。

有趣的是，方案背後的理念亦和共享經濟的理想相近，宣揚人們應把注意力放在使用、而非擁有[註二]。在物質生產過剩的年代，人們根本毋須再花心思囤積私有財產，反而應把心力轉向人本、社群和具創造性的工作上。兩位作者更把這種根本性的社會文化轉向，與佛學人生哲理拉上關係。這和 E. F. Schumacher（1911-1977）在《小即是美》中提到的「佛系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竟也不謀而合。（詳見下文）

二次方投票的民主制度

《激進市場》書中另一個重要的建議，是將某種市場機制注入民主制度，讓公民彷彿可以「用錢包裡的錢」投票。設想每名公民每年均可獲發100份額的「發聲信用額」(voice credits)，並可用於廣泛政治經濟議題的投票上。假如一位公民在100個議題上投票，則每個議題遂可投下1票；但假如另一位公民想集中票源，以提高其在特定議題的影響力，例如他想在某個議題投3票，則所需信用額便會是3的二次方，即9個份額的信用額；欲投5票便需要25個份額，如此類推。

兩位作者設計的「二次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 機制，主要目的是讓公民毋須事事表態，反而可把選票留在其偏好的議題上。少數利益的聲音亦可被放大，形成抗衡「多數人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 的可能。二次方的設定，則令公民更審慎利用一次投多票的權利，確保選票用於他們真正重視的議題。如何恰當地平衡多數利益和少數利益，正是這種機制設計的主要精神。

「機制設計」與「設計思維」

不無巧合的是，上述方案起碼在原理上，和我提出的「全民擁有創新社區」(Citizen Owned Innovation Community, COIC) 建議，有極大的可比較性。兩者均強調把土地和數據這些重要財產，作為共同產權的性質和意義；兩者同樣強調使用權乃屬臨時性質，並且可按市場效益進行動態調整；兩者並強調由此衍生的收益，應由集體共同分享[註三]。

兩者的分別則在於：COST 方案建議把土地開放競投，並以課稅金額作為分配使用權的準則，而 COIC 所採用的則是持股人投票方式，來分配創新社區的土

地使用權；COST 方案由承包者主導發展方向，COIC 仍是由承包者主導，但同時需向投票支持的持股人負責；COST 並不強調對土地用途的規限，COIC 則由持股人「用錢投票」，直接選出具體的土地用途。

相比之下，二次方投票強調公民在廣泛政治經濟事務上，皆可享有投票權，而票源則可各取所需，集中在各自偏好的議題上。COIC 固然亦是一種直接民主的模型，並只集中在單一議題（即創新社區）上；惟一旦這模型實驗成功，能推廣至更多其他層面之上，則屆時亦可採用二次方投票為原則，讓公民作為持股人自行分配票源在不同的範疇上。

無論如何，不同方案多少均源於 Vickrey「機制設計」的構思，力圖通過遊戲規則的設定塑造人的行為，調和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矛盾，從而達至共享多贏的結果。它所注重的並非（如「行為經濟學」般）微觀行為的干預，而是宏觀制度上的資源分配機制。在某程度上，它正是把 Ostrom 對共同資源管理的探討，進一步落實成當代社會適用的具體方案。

此等不同方案會否只是學者「堅離地」的空想？象牙塔內不切實際的思考練習？對此我並無確切的答案，但正如本書第三章指出，2019 年諾獎得主 Abhijit Banerjee 與 Esther Duflo 所揭示，我們實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不同方案可先構思或大型或小型的「實驗原型」（prototypes），通過或長期或短期的持份者參與測試，不斷反思和改良方案的設計。被稱為「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的研究方法，不約而同地強調以人為本的在地實踐經驗，亦是避免自上而下閉門造車的關鍵方法。

取代薪支的數據產權

《激進市場》書中提出的市場機制，尚包括在數據有價的年代，人工智能取代受薪工作之際，要求資訊科技企業取用個人數據時，需向數據擁有者支付相應費用。在工作崗位數目縮減之餘，仍能提供一定的薪支回報，令科技發展的成果更公平分配。其他方案尚包括：本國公民接收外來移民勞工，可分享移工部分收入作為回報；重新切實履行反壟斷法，禁止同時投資多家同類型企業，避免單一集團主導某個行業。

其中科技企業支付取用個人數據費用的建議，恰巧亦和我同期探討「數據產權」(data ownership) 的概念不謀而合[註四]。兩者同樣將數據視作重要的共同資產，並以此為基礎分配帶來的經濟效益。事實上，在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今天，上述眾多看似繁複的市場機制設計，從技術層面來說難度皆並不高。如何實現的問題並不大，能否進行實驗才是問題。

註一：　見於姚松炎、蘇文英編：《選擇・未來：香港2030＋民間替代方案》。2017。

註二：　〈物聯網：物質過剩與後資產社會〉，本書第十章。

註三：　〈全民擁有的創新國度〉，本書第十章。

註四：　〈從數碼監控到數據產權〉，本書第九章。

2. 尋找資產為本的未來視野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 Ideology
2020

2020年，當法國學者 Thomas Piketty 的巨著《Capital and Ideology》出版之際，我實在有如獲至寶的感覺。但由於任教課程的更動、各種本土問題的困擾，加上這本厚逾1,000頁的巨著令人望而生畏……種種原因令我幾乎把它忘記了。直至菲律賓著名學者 Walden Bello 上載了該書的導讀[註一]，才讓普羅讀者更易一窺 Piketty 的學術殿堂。正如 Bello 指出，這確是一本人所共知、卻又鮮為人認真研讀的巨著。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Piketty 在2014年的《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嶄新角度審視資產及收入不均，在全球牽起極廣泛的討論，Piketty 更被喻為「廿一世紀的馬克思」。但其實舊作更多只是描述而非分析現象。相比之下，新作便擁有更清晰的理論框架，覆蓋更宏大的歷史視野，並且對人類未來更具有明確的指向性。

貧富懸殊為何視而不見？

Piketty 的新書為何重要？因為它直指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但為何這書卻相對不受重視？其實就正如書中一語道破的，因為人們從來對真正問題視而不見——人類歷史作為「不平等體制」（inequality regimes）的歷史，其核心任務正是為不平等塗脂抹粉，並致力抹煞促進平等的各種可能性。這令人們傾向相信不平

等是「自然」的，「沒有其他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只能乖乖認命和接受極不合理現狀。

且讓我們先把目光放回當下現實的香港，這個長期號稱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市，主要行業卻存在嚴重的寡頭壟斷，欠缺最基本的開放性和競爭性，令小市民任由大集團的魚肉。尤其甚者是，市場壟斷更多並非源於市場自然淘汰，而是出於政府政策的長期傾斜。既得利益集團在畸形政制的加持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主導力量——這些都是路人皆見的顯淺事實，就只剩下可憐的香港人，仍天真相信自由市場的神話。

為何「不平等體制」能如此強大？ Piketty 主要歸因於意識形態的力量。它一方面叫人（仍然）普遍相信，通過努力便能向上流動和累積資產，並把失敗歸咎於個人缺失；另一方面則將私人產權邏輯推向極致，鼓勵資產無止境地高度集中。即使已構成凌駕性的政治經濟力量，極度妨礙競爭和社會流動，但只要仰望權貴生活來望梅止渴，香港人便甘之如飴。

左翼政黨為何遠離基層？

普羅市民時常夢想發達，因此對意識形態的神話照單全收；然則推動社會改革的政治領袖呢？設想被剝削的草根階層欠缺反抗的動力，按理卻總有代言人可以為他們出頭，帶領他們戳破「不平等體制」的虛偽和荒旦。為什麼政客們不善用這些機會，整合出反抗體制的政治陣線呢？

正如 Piketty 不無深意地指出，傳統西方民主的左右翼二元格局，在過去40年已被徹底打破。其中左翼政黨愈益蛻變成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代表，與草根

階層的利益愈行愈遠；那些在全球化和就業機會流失下飽受摧殘的基層市民，則只能日益向右翼民粹主義靠攏，把怒氣發洩在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身上。兩者皆無助化解日益嚴峻的社會政治矛盾。

儘管香港面對著迥異的政治現實，但 Piketty 的洞見仍有相當的借鏡作用。由於中港政治的長期困擾，無論泛民或建制派都泥足深陷，皆無力再專注於基層民生問題，更遑論提出具前瞻性的社會改革綱領；大多數智庫皆依附於權貴精英，難以發出客觀中肯的良知聲音；相反被剝削階層則只能傾向右翼民粹，把貧富懸殊的焦點轉到外部人口的因素上，卻完全無視香港「自由經濟」本質上的缺陷。

學者為何不說句公道話？

然則學富五車的大學教授呢？為何沒多少人能挺身而出，站在更超然和公正的位置上，說句發自良心的公道話，如 Piketty 般一語道破社會的虛偽和殘酷？為何尊貴學者都躲在象牙塔內，無法為社會進步和市民福祉，提供更明確的指引和出路？

首先，這固然涉及香港專上教育體制，只一味引導研究和教學走向國際化，大學片面追求國際排名和所謂「影響力因子」，對當下水深火熱的社會矛盾視若無睹。至於另行設立的「政策研究資助計劃」，在直屬行政長官的創新署管轄下，研究課題皆早已被自我審查，能否支持研究敏感的體制改革，自亦可想而知。

其次，即使撇除制度上的「過濾作用」，個別學科和學者能否建立對現實的有效認知，同樣不無疑問。須知學者早已習慣了抽象的學術思維，終日沉溺於概念和理論的世界中，對現實的理解往往只能通過一大堆數據（看看我們的教授

局長便知！）；卻完全不會考慮（或沒有能力）深入社會各階層，在現實處境中累積第一身經驗，試問又如何能切中問題核心，對症下藥？

其三，更為關鍵的是，這和學科的傳統範式亦大有關係。就以我近期任教的政治學課程為例，便發現文獻往往只集中討論政治規章制度、概括性和理想化的概念，卻沒有放眼於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環境，無法洞悉更根本的「深層次矛盾」。經濟學就更不用說了，抽空現實脈絡所建立的理論模型，總是把「堅離地」的想像視作理所當然，更不會對社會不平等說半句不。至於我的老本行社會學嘛，近年關於身分政治的研究多的是，但要找一份像樣的階級分析也沒有。

事實上，這些「學院派」的老問題，我早已在《香港的鬱悶》（2006）一書中詳述。近年自己在大學任教，就更覺問題早已積重難返。數年前有見及此，遂有了建立民間自主研究機構的想法，但至今專上學者的參與仍少之有少。

資產作為一種學術視野

Piketty 的巨著從經濟學出發，卻涵蓋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廣泛領域，提供重新審視社會不平等的獨特視角，令沉睡的學術界如在夢中驚醒。他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歷史並沒有既定的發展路向，它全視乎人們如何作出集體選擇——是一直如鴕鳥般把頭埋在沙堆裡，抑或願意真誠面對自己的選擇？

傳統上，我們會從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來審視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但我們往往只著眼於現金收入，以及其購買力所能解決的短期生計需要。因此只要像財政預算案般多派消費券，人們便能通過即時消費提升生活水平。但卻無視

這些消費券，數個月後又通通回流至大財團的賬戶中，制度和結構性不平等則進一步鞏固。

Piketty 所提出的，則是一個更根本的資產擁有權問題。資產所涵蓋的不但是現金收入，更是我們能夠掌握的生產工具。在當代社會裡，人們往往只能掌握知識這種資產，並正日益面對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衝擊，卻早已無法掌握其他生產工具，因此亦喪失市場討價還價的能力。根據 Piketty 的建議，我們不但需要更加公平的累進稅制，還需要更合理的資產擁有權和管理權，例如員工擁有公司股份和參與管理的權利，以至知識產權更開放和公平的分配。

我想再次強調的是，這不單只是一個解決社會不平等的方案，它更是一種聚焦問題根源的理論框架。現金收入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位處其下的才是遠為廣泛的資產擁有權問題——沒有開放的產業環境讓我們一展所長，沒有自主的城市空間讓我們自立自強，沒有公平的市場機會讓我們自力更生，如此類推。尊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學者們，為何如此一個基本問題，卻總無法打破因循守舊的學術範式，進入你們的研究視野呢？

註一： https://focusweb.org/publications/reading-piketty-i-a-concise-and-comprehensive-summary-of-capital-and-ideology/

3. 拜托！回到經濟學經濟！

張夏準
拚經濟：一本國民指南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
2015

Kate Raworth
甜甜圈經濟學：破除成長迷思的7個經濟新思考
Doughnut Economics :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
2018

主流經濟學家不務正業

經濟學不是用來研究經濟的嗎？原來還真的未必是。正如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張夏準說，你看看幾本最暢銷的經濟學書籍，包括 Tim Harford 的《The Logic of Life》（2008），副題是"undercoveringthe new economics of everything"；Steven Levitt 和 Stephen Dubner 的《Freakonomics》（2005），副題是"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至 於 Robert Frank 的《The Economic Naturalist》（2008），已算是最「謙厚」的一本，因為副題只是"why economics explains almost everything"！

假如 Thomas Piketty 把我們的視線，帶到主流經濟學家有意無意忽視的一些經濟問題；那麼張夏準就更直接了當地告訴我們，經濟學（economics）根本和經濟（economy）無關！

為何這些經濟學書籍號稱能解釋「所有東西」？對不起，我實在沒有時間深究下去；但正如張夏準已一針見血地指出：這至少反映出主流經濟學家不務正業，

因為他們最無法解釋的正是經濟現象本身！張夏準認為，主流經濟學家似乎皆有極度自戀的傾向，試圖將經濟學方法涵蓋一切人類社會現象，但連學科本身的基礎亦混淆不清——對人類社會如何生產、分配和消費產品，經濟學家卻無法提供有效和清晰的理解！[註一]

張夏準的《拚經濟：一本國民指南》（2015），和下述的 Kate Raworth 的《甜甜圈經濟學：破除成長迷思的7個經濟新思考》（2018），均是近年相當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但和本書提及的其他所有出版物不同，兩者皆可被歸類為經濟學的教科書——只是它們皆大異於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甚至刻意告訴你一般教科書是如何把你誤導！

張夏準的出發點乃是經濟學史，他首先描述資本主義過去200多年的發展，是如何一步步塑造經濟學這門學科。自1970年代起進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又是如何深刻地重塑全球資本主義。他進而列舉列合共多達九個經濟學派別，對經濟現象提供了迥異的視角，新古典經濟學只是其中之一。可惜的是，主流經濟學生卻往往被蒙在鼓裡，不知學科百花齊放的原來面貌！

九個經濟學派別的比較

	古典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奧地利學派	熊彼德學派	凱恩斯學派	制度經濟學	行為經濟學
經濟由…組成	階級	個人	階級	較傾向階級	個人	沒明確取向	階級	個人和制度	個人、組織和制度
人是…	自私和理性	自私和理性	自私和理性，工人運動除外	沒明確取向	自私而多面的	具超出理性的創新精神	不太理性	複雜和多面的	有限理性和多面的
世界是…	肯定的	肯定而且風險可控的	肯定的	不肯定的，但取向不明確	不肯定的	複雜的	不肯定的	複雜和不肯定的	複雜和不肯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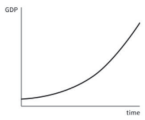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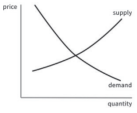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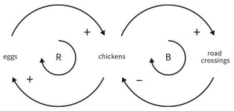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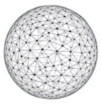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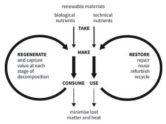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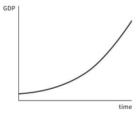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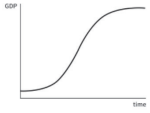
九個經濟學派別的比較									
	古典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	奧地利學派	熊彼德學派	凱恩斯學派	制度經濟學	行為經濟學
最重要的經濟活動是…	生產	交易和消費	生產	生產	交易	生產	少有談及生產	略有談及生產	較多談及生產
改變經濟的因素是…	投資	個人選擇	資本累積，階級鬥爭	發展生產能力	個人選擇，但受傳統影響	科技創新	沒明確取向	個人和制度互動	沒明確取向
政策建議	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或政府干預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臨時性的政府介入和干預	自由市場	不確定，相信資本主義不斷萎縮	積極財政政策，財富再分配	沒明確取向	較接受政府干預

源於：張夏準 (2015).

廿一世紀經濟學家的七種思維

相對於張夏準通俗淺白的經濟學入門書，Kate Raworth 的《甜甜圈經濟學》則可說是深造班的教材。假如前者更多追溯經濟學的發展史，後者則是前瞻廿一世紀經濟學家所需的思維革新——它更多從地球生態的角度，通過甜甜圈兩個圓環的類比，形象化地描畫人類福祉的下限和生態的上限[註二]。

對 Raworth 來說，經濟學家必須致力擺脱廿世紀的成見和誤判，尋求更切合當下社會生態需要的新論述。她把思維革新歸納為七個主要面向，呼籲經濟學家放棄對 GDP 崇拜、拋棄對自足的市場、理性經濟人和機械的均衡等錯誤假設，並不要再迷信增長能帶動分配和環保。反過來說，經濟學家應更致力達至「福祉 - 生態甜甜圈」的均衡，將人視作適應社會的動物、市場視作環境的一部分及深具動態混雜性，並探求分配和再生為本的市場設計。

廿一世紀經濟學家的七種思維				
七種思維	**廿世紀經濟學**		**廿一世紀經濟學**	
1. 改變目標	GDP		甜甜圈	
2. 看見大形勢	自足的市場		嵌入環境的市場	
3. 培育人性	理性經濟人		社會適應人	
4. 對系統敏銳	機械的均衡		動態的混雜	
5. 配合分配的設計	增長帶動分配		分配為本設計	
6. 配合再生的創造	增長帶動環保		再生為本設計	
7. 對增長保持懷疑	對增長執迷		對增長保持懷疑	

源於：Kate Raworth (2018).

簡略而言，現時主流經濟學傾向將市場孤立來看，將市場與外部環境、混雜系統切割開來，對其置身的社會和生態脈絡視若無睹。廿一世紀經濟學家需要做的，正是把原來不被納入經濟學分析的元素，盡皆重新納入經濟學的範疇之中。只有放棄瞎子摸象式的片面理解，拋卻那井底之蛙式的狹窄思維，經濟學才能直面人類社會的重大挑戰。

我個人的想法是：熟讀張夏準和 Kate Raworth 這兩本書，比讀一個主流經濟學的本科課程，肯定更有用得多。

註一：　另可參見張夏準的系列講座，包括：https://youtu.be/D-6rQmHpGfE

註二：　另可參見本書的系列動畫，包括：https://youtu.be/Mkg2XMTWV4g

4. 資源如何定義？由誰定義？

E. F. Schumacher
小即是美：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
Small is Beautiful :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1973

Charles Eisenstein
貨幣革命：後危機時代的經濟博弈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2011

Michel Bauwens and Alex Pazaitis
P2P Accounting for Planetary Survival: Towards a P2P Infrastructure for a Socially-Just Circular Society
2019

E. F. Schumacher 的《小即是美：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1973），可說是一本奇書，文字淺白，頁數不多，包含一堆題材鬆散的文章，至今已出版近50年。但我卻無法找到相似的替代品，這可說是一本拒絕被遺忘的書。

我們當然可以視 Schumacher 為環境或生態經濟學的先驅，但《小即是美》的視野卻遠超於此。這書是對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人定勝天、捨我其誰的時代精神，一次最徹底而深刻的反思。它讓我們看到大規模工業生產下，物慾橫流的虛假繁榮背後，人類所共同忘卻的、失去的、付出的代價是何等巨大。

難得的是，書中更多以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角度出發，指出他們有權享受的另類發展道路。那並非盲目的復古或尚農信念，而是一種因地制宜的工業化道路。書中最常被引用的概念是「適切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小巧、貼地、具抗逆力、能創造而非取締就業機會的科技。30多年後，印度拉達克地區的真實個案，在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2009）中被廣傳於世。

假如要在當代找一本能相提並論的書，則非 Charles Eisenstein 的《貨幣革命：後危機時代的經濟博弈》（2011）莫屬。不無可惜的是，這本書的中文譯本來自內地，中譯書名和原名相距何止千里；但把焦點放在「貨幣」上，卻仍總算忠於原著精神[註一]。

Eisenstein 追溯貨幣在人類歷史上的角色，指出它是如何深刻地重塑我們的觀念、變成我們生活的語言，並且改造以至扭曲了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係。對利潤無止境向上的追求，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盛典和夢魘。它被奉作自高無上的金科玉律，消滅了其他一切人類珍視的價值。它泡製出一個空前眩目的華麗舞台，但沉重代價卻是由所有人、包括子孫後代共同承受。

書中同樣花了極大篇幅，提出各種另類發展的方向，包括負利率貨幣（源於早被遺忘的、廿世紀初經濟學家 Silvio Gesell）、社區貨幣、資源為本經濟、饋贈經濟、開拓共同資產等，提供了一幅極為詳盡的邁向未來路線圖。

與前兩位作者相比，Michel Bauwens 同樣具有遠大視野。我甚至常和學生開玩笑說，假如由我來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話，我便會選擇頒給他[註二]。但這裡選出的一部作品，卻只是他和 Alex Pazaitis 合撰的一本工具書：《P2P Accounting

for Planetary Survival: Towards a P2P Infrastructure for a Socially-Just Circular Society》（2019）。

正如書名開宗明義指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會計問題——如何紀錄什麼是重要的、有價值的，並以此為基礎引導人們追求重要的、有價值的東西。可惜的是，資本主義的會計制度卻一味營造業績的假象，把空前巨大利潤建基於主要成本皆不入賬！但隨著區塊鏈和傳感技術的進步，一個能更有效管理人類共同資產的 P2P 會計系統正迅速冒現。

假如前一文章的兩本作品，足以根本扭轉我們對經濟學的看法；這裡介紹的三本作品，則應能扭轉我們對經濟活動的看法——並且提供了具體指引行動的策略。

註一：　英文原著可於其網站上閱讀：https://sacred-economics.com/read-online/

註二：　Michel Bauwens 的眾多其他貢獻，可見諸他創辦的 P2P Foundation：http://wiki.p2pfoundation.net

5. 轉化路徑的策略選擇

Erik O.Wright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J.K. Gibson-Graham, Jenny Cameron and Stephen Healy
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邁向幸福經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
Take Back the Economy :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
2013

Nathan Schneider
Everything for Everyone: The Radical Tradition That Is Shaping the Next Economy
2018

Peter Barnes
OURS: The Case for Universal Property
2021

在古典時期，我們並沒有經濟學，有的只是政治經濟學。因為政治和經濟從來密不可分，強行分割只是經濟學一廂情願的幻想。

假如前文介紹的七本書，皆旨在提出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並建構另類的經濟想像，則這裡提出的四本書，就更正接了當地，提出超越資本主義的某種社會主義理想[註一]。個人的意見認為，逾百年黨國社會主義的事實，確令人對這個老舊概念談虎色變、避之不及；但撇除概念上可能帶來的誤解，某種在政治上具突破性的提案，在當下政治經濟困局中亦極必須。

其中 Erik O. Wright 和 J.K. Gibson-Graham 的名字，亦是我們在課堂上常常觸及的名字；但除了較早期那些艱深的著作，他 / 她們近年也出版更適合一般讀者的著作。其中《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2019），更是 Wright 於同年逝世後出版的遺作[註二]。書中倡議的是非中央集權、自下而上參與、民主管理的「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

對 Wright 而言，急風驟雨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已不可行，我們更有賴體制內外的漸進改革力量，既致力探索各種新的經濟模式，亦嘗試改變既有的遊戲規則，逐步擴大影響力和蠶食資本主義的根基。這個循序漸進的探索實驗過程，亦給予各方學習和改進的空間，令新模式更加切合現實需要，避免過往社會主義的閉門造車。

至於 J.K. Gibson-Graham，實際是 Julie Graham 和 Katherine Gibson 二人共用的筆名。其中 Graham 已於2010年逝世，Gibson 則原用她們的筆名以茲紀念。《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邁向幸福經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2013）內容同樣異常淺白，致力打破一般人面對資本主義市場霸權的無力感，探索另類經濟模式的可能性。

書中提供一個「多元經濟」的簡明框架，讓人能根據日常生活的經驗，開啟另類勞工、企業、交易、產權和金融關係的想像。事實是除了資本主義的受薪僱佣、利潤至上的企業和市場交易，以至壟斷化的私有財產和主流金融，人們還有各種自主選擇的經濟模式，毋須自困於資本主義既定的思維框架[註三]。

多元經濟				
勞工	**企業**	**交易**	**產權**	**金融**
受薪僱佣	牟利企業	牟利市場	私有產權	主流金融
另類薪資	另類資本	另類市場	另類產權	另類金融
無償勞動	非資本	非市場	開放產權	非金融

源於：J.K. Gibson-Graham et al (2013).

這裡介紹的第三本書，則是 Nathan Schneider 的《Everything for Everyone: the Radical Tradition that is Shaping the Next Economy》（2018）。作者乃來自記者而非學者背景，自2010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後，開始專注於研究「合作經濟」(cooperative economy)，其後並成為「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 的主要倡導者[註四]。

現行合作社運動至今已有近180年歷史，乃是由會員民主管理的經濟組織模式，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亦異常普遍。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合作社運動再度

百花齊放，探索經濟危機下的另類可能出路。由於網絡平台的普及，令市場配對和交易成本大為降低，更提供了人們自發自主配對合作的新可能。現存共享平台構成嚴重的市場壟斷，最終亦會被資訊科技的發展所打破。平台合作主義正是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案。

至於最後一本書，則是 Peter Barnes 的新作《OURS: the Case for Universal Property》（2021）。單看書名中的「普遍資產」，你或許以為 Barnes 是個共產主義者！但他本身其實是一位創業家，並身體力行推動良心企業和經濟民主[註五]。

對 Barnes 而言，人類資產或財富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由人自身通過努力創造的私人財產；其二則是普遍資產，即人類共同承繼的大自然資產。現實中的產權關係，則有賴特定的社會、政治和法律體制實現，那是人集體想像出來的結果。可惜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資產大量被刻意地「圈定」為私人資產，就如十七世紀英國的圈地運動一樣。

Barnes 認為，要取回已被圈定的產權相對困難，但界定新的普遍資產則比較容易。事實是已被圈定較諸未已被圈定的資產，亦只是冰山的一角。因此要令當代經濟重拾均衡健康的發展，關鍵是大量發展普遍資產，不但令所有人能更公平分享產出所得，同時亦更有利於維護子孫後代共同享用。他指這個概念其實並非新創，而是來自200年前的思想家 Thomas Paine，只是原初啟蒙運動的進步精神，多年來已被扭曲得蕩然無存[註六]。

註一： Thomas Piketty 的新書：《Time for Socialism: Dispatches from a World on Fire, 2016-2021》（2021），也直接用上「社會主義」的名稱。

註二：　Wright 大部分著作及曾教授課程，仍可在其網站上找到：https://www.ssc.wisc.edu/~wright/

註三：　其他實用的分析框架，可見諸此書的網站： https://www.communityeconomies.org/publications/books/take-back-economy-ethical-guide-transforming-our-communities

註四：　我並無採用「平台合作主義」一詞，但相近的討論可見諸本書第十章。

註五：　此書基本內容及作者簡介可見諸：https://universal-property.org

註六：　另見宇澤弘文：《社會共通資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鄒崇銘：〈啟蒙運動打造的「想像的秩序」〉，《敵托邦》。毫末書社，2022。